

VUCA 时代本土管理情境特征的结构化演化研究

高 昕¹, 苏敬勤^{2*}

(1. 大连海事大学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2.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管理学科的实践属性决定了管理理论具有较强的时空情境依赖特征。本土情境作为中国企业成长不可分割的基本载体,也是促进管理理论与特色实践交融共生的底层影响要素。鉴于当前普遍存在“西方理论难适用”与“本土理论难开发”的共性问题,背后均指向对本土情境认知的泛化、碎片化、静态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对 VUCA 时代本土管理情境特征的结构化梳理,刻画了本土情境演变的动态谱系和情境要素间的复杂组合,由此呈现出兼具静态与动态、时间与空间、单一要素与多元组合等多维视角下的复合情境观。进而,在促进本土情境认知结构从离散化、架构化向谱系化与组合化演进的同时,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复合情境观在本土管理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嵌入角色与作用。通过明确时空情境敏感性下的“新背景-新过程”双维问题筛选机制,厘清本土情境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嵌入”与“涤除”平衡策略,推动本土管理理论研究走向兼顾“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的深度情境化阶段。

关键词:本土情境; 动态性; 复杂性; 复合情境观; 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62(2024)02-0008-013

DOI: 10.13587/j.cnki.jieem.2024.02.001

0 引言

管理学科较强的实践属性决定管理理论具有高度情境依赖性,既体现在管理研究对象所处个体、组织与生态等多层次复杂宏观背景,也体现在管理规律随社会发展不断演进的鲜明时代性与动态性^[1]。因而,兼顾复杂性与动态性的情境化管理研究是管理理论建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2]。近年来,在 VUCA (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mbiguity) 时代的高度不确定性下,中国企业在转型经济与数字经济等多重背景交替叠加下,涌现出了新型举国体制、后发追赶、二次创新等独特成长规律和换道超车的发展契机,与其他经济体企业不尽相同的跟跑、并跑与领跑并存的中国式企业创新实践,正在成为培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天然土壤^[1]。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诸多本土企业在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理论与方法时,也不断出现“水土不服”问题^[3]。当舶来理论对灰度管理、阴阳思维、集体主义及政商关系等中国独特管理实践解释乏力之际,大量本土研究基于以中国数据印证并拓展西方理论的成熟范式,也较少挖掘出广受国际认可的本土管理新构念与新规律,使得对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探索仍迟滞不前^[4]。鉴于本土企业创

新管理实践,与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所处的独特发展阶段以及制度、技术等宏观情境的动态演变与复杂叠加息息相关,要缓解“西方理论难适用”与“本土理论难开发”这一悖论性问题,则亟待提高对本土情境独特特征的结构化认知与系统刻画,进而推动其在理论化过程中的深度嵌入^[5]。

自徐淑英等学者呼吁情境化是中国管理研究、本土理论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后^[5],学者们开始寻找并刻画中国情境的显著特征,并从关注转型经济、新兴市场等泛化的宏观背景,逐步聚焦到具体情境要素,并将其架构化为 PEST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technological)、MIT (market, institutional, technological) 等情境模型^[6],但仍未扭转对中国情境本质特征解构不足的整体局面。一方面,表现为对本土情境要素连续演变的动态性特征彰显不足。当前研究对中国情境架构与要素特征的认知多从单一时点等静态视角出发,虽基于 PEST、VUCA、MIT 等宏观分析框架对制度、市场、文化等要素进行了广泛覆盖,但多停留在以强政府、大市场、弱技术等情境要素的静态初始特征作为研究假设与前提^[7],缺乏在时间视角下即时更新转型情境的多元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过程,从而影响了情境假设沿用的合理性以及对本土管理实践动态规

收稿日期: 2022-12-28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34)

*** 通讯作者:** 苏敬勤(1961—),男,湖北武汉人;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情境、平台治理。

律捕捉的准确性^[1]。另一方面,对多重情境要素叠加组合的复杂性亦缺乏深入研究。学者们借鉴西方理论引入制度基础观、产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等多种理论视角^[8],分别从制度与行业规制、产业规模与市场结构,或技术资源短缺等单一情境出发,探索离散化的情境要素对本土企业管理实践的影响。但中国情境较其他经济体的显著差异,恰恰体现在根植于多元制度与文化基础上的多重情境要素的复杂交织与叠加组合^[9]。正是由于对本土情境的独特特征缺乏系统认知与深度嵌入,致使本土管理研究仍存在浮于现象、片面化、泛化和理论贡献不足等弊端^[2],这也是诸多学者呼吁并提出情境本位模型、多层次情境化方法,以提高本土管理研究理论价值与贡献的重要原因^[10]。因此,从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对本土情境进行系统的结构化解构,也是进一步推动本土企业领先实践与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交融共生的重要突破口。

由此,本文围绕中国情境架构中普遍包含的制度、市场和技术三大核心要素,在时间视角下以动态谱系呈现了本土情境要素连续演变的速率、幅度及非对称性等动态性规律,在空间视角下以复杂组合拓展了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与冲突等复杂性特征,通过兼顾本土情境的静态与动态、时间与空间、单一要素与多元组合等复合特征,为本土管理研究走向深度情境化阶段奠定了底层的复合情境观。在推动对本土情境的认知结构从离散化、架构化演进到谱系化与组合化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复合情境观在本土管理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嵌入策略与作用。通过明确基于情境敏感性的“新背景-新过程”双维问题筛选机制,厘清本土情境在理论研究中的“嵌入”与“涤除”平衡策略,为彰显中国特色企业实践、提升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奠定兼顾“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的策略参考。

1 理论回顾

根植于实践的管理学科与组织理论均以各自的方式依赖于情境,并强调理论与情境的共同进化^[11]。管理理论既存在主体多、范畴广等复杂性特征^[1],也存在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的时代性与动态性规律^[2],因而,要彰显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与西方成熟理论不尽相同的动态性与复杂性^[12],离不开对本土独特情境的结构化认知与深度嵌入。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情境开始受到本土管理学者的广泛关注^[5],并在管理实践挖掘、理论边界识别与本土管理理论开发等方面承担着日益重要的关键角色^[13]。随着相关研究对本土情境内涵及其构成的不断拓展,形成了由泛在到具象的情境化研究基点

转变。最初,中国情境在管理研究中多被标签化为转型经济、后发追赶、新兴经济体等宏观背景^[14],从而将研究问题拓展到独特的本土宏观经济制度等基本国情特征之下。这打破了早期仅将中国情境视为检验西方理论的数据收集渠道,以及由此形成的情境无关(context-free)理论假设^[9],避免了学术发展的“同质化”风险。然而,泛在的情境表象虽具备较高的概括性,但缺乏对具体情境要素的本土化特征挖掘,仅能够作为研究背景嵌入,难以作为具体变量纳入到研究框架或理论边界,进而影响了本土管理理论贡献的深度挖掘与本土化构念的提出^[15]。

随着本土情境研究不断深化并进入具象层面,衍生出中国情境的宏观架构与微观要素两类探索方向。具体来说,在宏观架构层面,苏敬勤和刘畅^[16]将中国企业外部情境研究中涉及的政策、经济、技术和社会等要素归纳在 PEST 情境模型下,并在国家和组织层面分别凝练出物质情境和理念情境。魏江和刘洋^[7]通过识别并聚焦于非对称的市场体制、制度形态与技术体制三类情境,构建了中国情境的 MIT 框架。李垣和田龙伟^[17]则基于中国情境二维模型将中国企业所处独特情境划分为转型维度和文化认知维度,从而囊括了市场经济、政企关系、阴阳思维、官本位等情境要素。此外, VUCA 模型也成为了学界描述当前商业环境与组织特征的经典情境模型,即包含动荡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与模糊性的环境特征^[18]。此类宏观情境架构的“抓典型、广覆盖”特征,推动了我国情境研究的起步与繁荣,也为本土管理理论的情境化探索提供了基础框架参考。但鉴于其涵盖的要素相对全面且普适,且架构中往往缺乏时间维度,使得本土情境的具体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规律难以在研究框架中得到深度解构与嵌入。

在微观要素层面,随着情境逐步由背景转向变量,并下探到具体理论研究框架中,具体情境要素的特征及影响作用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部分研究将情境作为前因变量嵌入研究,通过引入制度基础观、产业基础观或资源基础观等理论视角,探索了政府干预^[19]、市场结构^[20]或核心技术资源^[21]等对本土企业成长规律的影响。也有研究将情境视为调节变量,识别了制度环境、政治关联等要素对企业研发投入^[22]、竞争策略^[23]改变的调节作用。此类研究多以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典型初始情境特征为假设,为本土情境要素在理论研究框架中的嵌入奠定了认知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推动了部分成熟理论在新兴市场背景下的应用、拓展与检验。但在情境要素嵌入范围方面,仍呈现出多关注市场、

制度等显性情境要素,而忽视社会、文化等隐性情境要素的不均衡现状^[15]。此外,尽管有研究呼吁关注中国独特的“强政府-强市场”特征及其二元作用的重要性^[7],但大量研究仍以单一情境要素为研究变量或理论视角,尚难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充分刻画因区域间、行业间不同情境要素起点不一、演变不同步带来的情境组合多样性与复杂性。

已有情境研究为突出对我国独特管理实践规律的挖掘,通过标签化、架构化、要素化等简化手段,将纷繁复杂的本土情境作为影响因素或变量,从而实现在理论研究中的初步嵌入。但随着本土优秀企业实践在世界舞台的不断涌现,以及各界对开发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呼吁,仅基于上述架构观或要素观尚难以持续推动本土管理研究继续迈向深度情境化的理论创新与建构阶段。一方面,源于对本土情境要素动态性演变规律的忽视。在高速转型的中国,同一企业很可能受多阶段情境的交互影响,在新老交替下形成更为多元、刚柔并济的复杂混沌情境特征^[24]。比如,对于制度要素,既存在政策强力驱动下的要素分配与制度型市场等带来的制度刚性^[7],也在诸多新兴领域的初创阶段体现出制度空白、制度不完善等制度柔性^[25],使企业既要不断从制度柔性中寻找创业机会,也要在成长过程中随时规范自身合法性以应对日益趋严的监管刚性。对于市场要素,则既在发展初期呈现出巨大的本土需求,为大量低端起步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快速成长的空间^[26],也因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致后期的市场需求升级与分层^[23]。而对于技术要素,同样既存在大量企业在发展前期面临着后发劣势与核心技术研发基础不足等缺失^[27],也在高铁、5G 等诸多领域逐步探索出了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技术集成优势^[28]。而前述静态视角下的情境架构观与要素观,因其多聚焦于情境要素在初始时点下的显性特征,尚难以推动对制度由空白到完善、市场由广阔到细分等情境快速演变下的企业创新管理规律探索。而深化动态视角下独特管理现象与新构念的挖掘,正是本土管理研究要实现深度情境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14]。

另一方面,则呈现出对多重情境要素组合复杂性认知的缺失。当前基于已有情境架构观和要素观的研究,多从单一情境要素视角展开,但要厘清我国企业独特实践较其他经济体的差异性来源,则离不开对多重情境要素叠加的复杂关系探索^[12]。例如,诸多后发国家都普遍存在技术起点低、卡脖子技术缺失等“弱技术”特征^[29],日韩也曾在国家战略与产业政策等政府“强干预”措施下,推动了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力发展^[30],印度等新兴市场企业则同样依托本国“巨大低端市场”需求与人口红利而得以快速成长^[31]。而反观我国企业之所以走出了与众不同的“中国式创新”之路^[32],则是在短期内经历了制度由空白到完善、市场由广阔到细分、技术由缺失到丰富等刚柔并济、多重情境动态交互与叠加的复杂过程^[24]。因而,本土管理研究若忽视制度、市场与技术等基础情境要素叠加带来的组合复杂性,将难以准确刻画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适用边界并推动东西方理论的对话和桥接,从而降低本土管理研究的普适性与理论贡献^[2]。

由此,本文基于理论推演与案例印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通过时间视角下的纵向演化与空间视角下的横向对比,力图在已有本土情境架构观与要素观的基础上,拓展其在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下的结构化演化过程,并明晰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嵌入策略,从而依托复合情境基础观,促进本土情境下的管理理论能够复合情境基础观,促进本土情境下的管理理论能够兼具“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

2 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下的复合情境观

2.1 本土情境的动态性特征挖掘——速率、幅度与非对称性

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转型加速与高度不确定性,管理实践普遍出现了从“线性管理”到“非线性生态管理”的复杂动态现象。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本土企业的后发追赶过程,既依附于各类政策的动态调控,也与转型经济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动态竞争态势息息相关。正因企业的成长路径高度依赖日益变化的宏微观情境,要厘清 VUCA 时代诸多中国式创新管理实践背后的特色管理理论,很难将其与本土情境的动态演变规律相割裂。具体来说,本土情境的动态属性主要体现在情境要素演变的速率、幅度以及非对称性三个方面。

其一,情境要素演变速率的动态特征。以技术情境要素为例,随着从工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的推进,各领域的技术演变速度也呈现出由后发劣势到追赶超越的加速迭代演进过程。作为后发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依托人口红利和较低的产业技术起点,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多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代工生产环节,长期模仿跟随而面临着被全球领先企业低端锁定的风险^[33]。但随着近年来信息化与数字技术的普及,部分供应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与能力升级,进而大幅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地位,乃至成为相应领域的隐形冠军^[34]。同样地,在复杂产品系

统、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本土企业长期面临着后发劣势与核心技术缺失等高壁垒技术瓶颈^[35]。但随着新型举国体制和创新平台生态系统的日益完善,在北斗、高铁、5G 通信技术等领域,也逐步构建了集中攻关的核心技术优势与工程实现技术的快速迭代能力^[36]。由此,形成了整体技术情境由缺失、跟随到丰富的动态演进过程,而在不同行业领域中,也体现为底层技术缺失、部分瓶颈难突破、应用技术领先等技术演进速率不均衡带来的多元技术情境并存。

其二,情境要素演变幅度的动态特征。以市场情境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需求既经历了由广阔到饱和的大幅跨越,也存在向细分市场、高端市场演进的小幅迭代。比如,我国早期依托庞大的人口容量产生了巨大的本土市场需求,为大量中小企业的低端起步提供了充足的成长空间^[37]。同时,也为我国产业发展初期诸多行业“市场换技术”的实施提供了可能。但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以及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带来的市场分割性约束加剧^[38],导致诸多消费品集聚低端市场并迅速进入红海竞争与市场饱和阶段。近年来,随着消费升级趋势的显现,本土企业为应对市场需求的逐渐分化,

开始向下沉市场、高端市场等细分领域分散,也催生了诸多本土企业通过在细分市场重新定位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围领先。由此,整体上形成了市场由广阔到饱和、由“大市场”到“细分割”等不同演进幅度带来的动态竞争情境。

其三,情境要素非对称性演变的动态特征。以制度情境为例,在传统制造领域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逐步塑造了新型举国体制、制度型市场等独特的政商关系^[39],使国有企业、传统制造企业等从最初的制度空缺演变为政策强力驱动下的市场要素分配,体现了制度刚性的生成过程。而在新经济领域,“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政策催生出了移动支付、超级平台等诸多新生业态,这种在既有规制缺乏适用性与新规制尚未出台的宽松环境中,为大量新创企业提供了包容审慎的快速成长空间^[40],演化出制度的柔性特征。由此,形成了在不同产业领域中刚柔并济的本土制度情境及其非对称性动态演化规律。综上,本文在时间视角下探索了情境架构中典型的制度、市场与技术要素,在演变速度、幅度以及非对称性等方面的动态属性,形成本土情境的整体性演变规律与动态谱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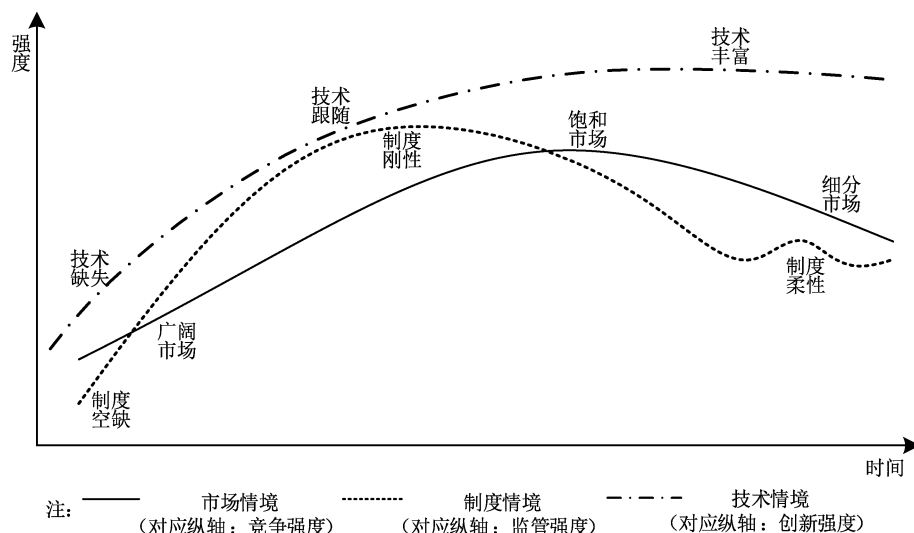


图 1 本土情境的动态谱系

Figure 1 Spectral dynamics of Chinese context

2.2 本土情境的复杂性特征呈现——叠加、传导与冲突

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本土情境要素在跨区域、跨行业等空间视角的横向对比中,也存在非同步、非均衡的演变速率与方向,使得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所面临的情境要素组合不尽相同^[38],从而体现为多重情境要素叠加组合的复杂性。当前,不断涌现的本土领先企业实践,分布在大国重器、民族品牌、平台经济、隐形冠军等诸多行业领

域,而要挖掘各类本土企业不尽相同的成长逻辑与发展规律,亟待厘清其所面临的技术、市场与制度等情境特征的具体组合,使得企业所处复杂情境得以系统地嵌入研究框架。具体来说,本土情境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多元情境的叠加、传导与冲突等带来的组合关系复杂性。

其一,是多元情境要素叠加下的复杂性特征。其中,既包含多要素嵌套形成的复杂制度逻辑,也包含宏微观情境的跨层次叠加,从而引致企业在面

对不同情境复杂性时做出差异化战略选择。在情境要素嵌套方面,以汽车等复杂消费产品企业为例,其主要处于制度刚性、市场广阔与技术缺失的嵌套情境下^[41]。在后发劣势下,虽然本土市场具有广阔的消费需求,但技术起点较低而难以实现核心部件技术突破,相关政府部门依托明确的产业扶持政策、技术标准制定等对行业发展形成了制度刚性。由此,在早期的“市场换技术”等多重制度逻辑叠加下,本土汽车企业多以外向型引进为主,通过合资、技术转让等方式模仿标杆企业,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零部件等模块进行微创新^[42]。而在情境要素跨层次叠加方面,则以同时处于宏观政策、行业竞争和生态系统等多级情境下的平台企业为例。作为新兴场域企业,大量平台成长于治理规制空缺、政策制定相对滞后的“制度柔性”背景下^[43]。早期面对巨大的用户基数、广泛的应用场景等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大量平台企业涌入传统衣食住行各个行业,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增强和平台生态的快速发展,也为缺乏架构技术的初创企业提供了多渠道技术赋能支持^[44],使其得以快速依托场景优势进行商业模式创新^[45]。

其二,是本土情境要素间传导的复杂性。以复杂产品系统中的核心企业为例,因其战略性产业地位和公共产品属性的特殊性,而处于天然的政策引领和制度刚性干预下^[46]。进而既带动了诸多产学研机构共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依托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对关键技术进行整合突破,也引导着国内外制度型市场的形成以提供持续订单获取保障^[32]。例如,在高铁等重大工程的前期推动过程中,经历了从政府全面主导、政府与核心企业共同引导到核心企业主导的生态系统构建过程^[36]。初期由政府独立担任架构者时,主要体现为制度主导下的技术合作与产品研发,以及政府强干预下的指令性计划市场订单需求^[47]。中期由政府与核心企业共同作为架构者,将强制度下的行政干预减弱为产业政策、资金资助等间接市场干预,而核心企业则围绕系统集成目标进行技术分解,自上而下促进关键零部件企业、用户、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构建一体化产业生态^[48]。后期,则由核心企业作为生态系统架构者,以突破牵引、制动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为动力,以海内外广阔的市场需求为拉力,以“一带一路”等宏观战略政策为保障,共同为中国高铁“走出去”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全球化竞争优势^[49]。由此,呈现出制度、市场与技术间的复杂传导作用与交互影响。

其三,是多元情境要素冲突带来的复杂性。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本土供应商为例,作为中间产

品提供者,一方面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分割型市场中,彰显成本优势保障订单规模^[50];另一方面,则需要依托核心技术优势突破低端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设计等环节攀升^[51]。为应对外部市场的低成本需求和价值链升级的高技术要求间的矛盾情境,衍生出了不同类型的供应商成长路径。其中,以满足市场低成本需求为导向的供应商多为一般代工企业,其通过不断降低成本以保障市场订单规模,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均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52]。在头部企业的捕获型治理结构下,较难突破低端锁定或实现价值链升级。而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高技术导向下的供应商,则依托多元客户的异质性需求与知识溢出不断提高专有技术,在相关领域实现较为扎实的技术积累^[34]。进而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价值环节,凭借技术优势和较高的价值链治理地位不断拓展新的市场需求^[50]。由此,虽同为供应商企业,但因其应对冲突情境要素的取舍差异,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复杂情境组合。综上,本文通过探索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或冲突等探索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或冲突等带来的复杂性特征,以识别不同类型本土企业所对应的复杂情境组合,如图2所示。

2.3 双重维度下本土管理情境的结构化演化

鉴于不断涌现的中国式企业创新实践,既根植于本土制度、市场及技术等情境的独特演变过程,也是多种情境要素复杂交互与叠加组合所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实践极具情境敏感性^[13]。若仅以某情境要素在初始状态下的静态特征为前提,或沿用国际话语体系中对管理实践的偏狭性认识与假设^[3],虽能够循迹性地检验或修正成熟理论的本土适用范畴,但在快速转型与充满不确定性的VUCA时代,忽视本土情境的动态属性已然造成了认知停留下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乃至理论价值性受限等问题,更难以厘清情境突变或渐变等背景下本土企业的复杂响应过程与动态演化规律^[4]。同样地,若缺乏对于不同类型企业所处多元情境的组态化认知,则会削弱我国企业实践与其他经济体不尽相同的基础差异来源,影响研究对独特因果关系、多维边界条件等的挖掘,从而弱化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与普适贡献^[53]。因此,要挖掘本土领先企业实践背后独特的理论贡献,亟待从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加强对本土情境的深度解构与嵌入,既要即时更新本土情境特征及其谱系化演变过程,以提升情境假设的合理性与时效性,也要深度刻画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复杂交织与组态化认知,以提升边界刻画的准确性与系统性,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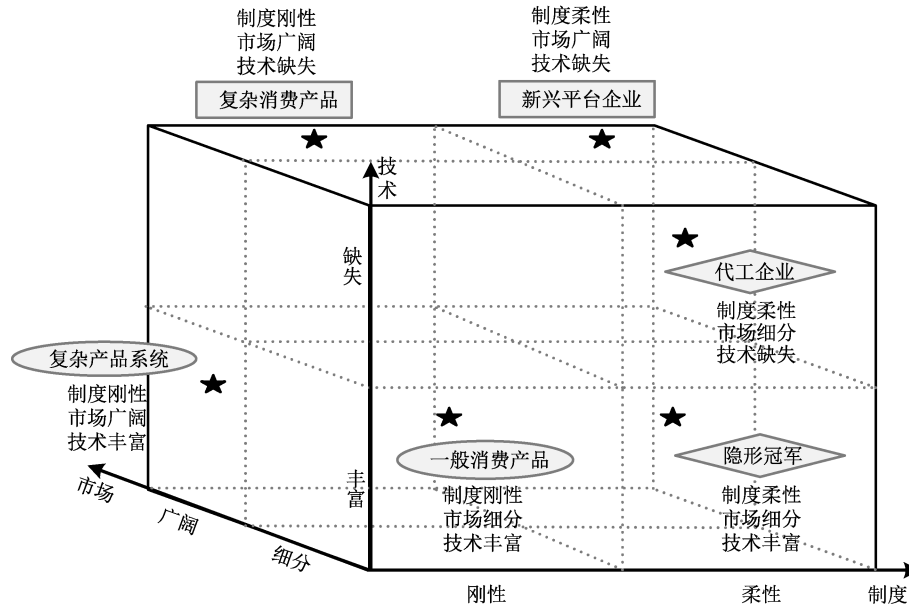


图2 本土情境的复杂组合

Figure 2 Complexity combination of Chinese context

打开本土企业成长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以讲“清”中国故事。

为通过本土情境的深度解构促进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开发,本文在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下进一步识别了本土情境的结构化演进过程。其中,以本土情境作为泛在背景(如转型经济、新兴经济体等)的离散化情境认知,代表着本土管理研究的情境嵌入起步阶段,而涵盖多重要素静态特征(如PEST、MIT、VUCA等)的架构化情境认知,则标志着本土管理研究的情境嵌入进阶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时间视角下的谱系化思路,以解构各个发展阶段核心情境要素在演变速率、幅度及非对称性方面的典型动态性特征,以及空间视角下的组合化思路,以呈现不同区域、行业背景的企业所面临的多元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与冲突方面的典型复杂性特征。由此形成兼顾时空视角的复合情境观,作为对已有情境认知特征的有益补充,推动本土管理研究迈向深度情境化嵌入阶段。基于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的本土情境结构化认知框架与演进过程如图3所示。

3 基于复合情境观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策略

上述双重维度下的本土情境结构化认知所突出的情境动态性及组合复杂性,对于研究者识别并明确管理主体的独特性(who)、管理实践发生时机的典型性(when)与主体所在区位及领域的代表性(where)等情境边界均具有重要作用,也为推动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建构提供了复合情境观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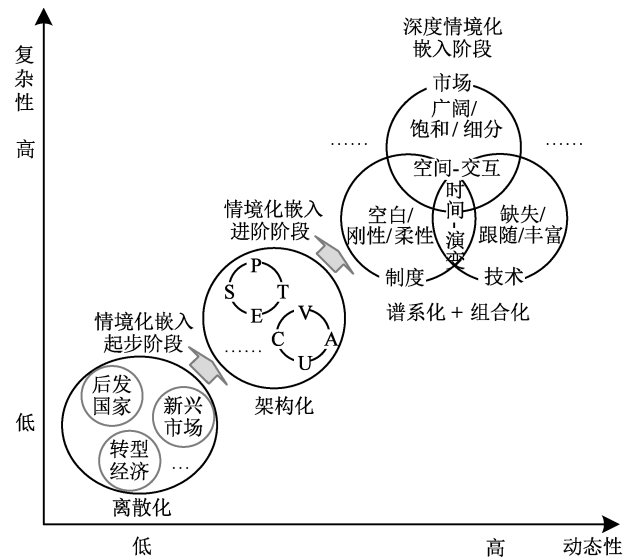


图3 对本土情境认知的双维演进过程

Figure 3 The two dimensional evolution of cognition of Chinese context

一方面,管理理论研究的情境依赖性要求学者亟须加强对研究背景和过程识别的准确性与连续性,从而彰显本土实践背后具有理论研究价值的“真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发现背后的情境边界识别与理论贡献提出,也将直接影响管理研究能否扎根并含摄本土情境以回应社会与企业关切,又能否涤除样本企业的情境唯一性,从而对西方既有理论体系做出可桥接的“真贡献”^[53]。因而,要缓解“西方理论难适用”与“本土理论难开发”这一悖论性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索情境化如何助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问题、构念与贡献的提出,厘清基于复合情境观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策略与机理。

3.1 依托时空情境敏感性洞见“真问题”

当前,优秀的本土企业实践不断涌现,既源自我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高速发展、赶超与转型,也展现出与其他经济体不尽相同的成长逻辑与发展路径。基于西方成熟理论体系下的后发国家追赶理论、低端锁定理论等已然不能全面系统地揭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创新追赶道路^[32],而要推动对前沿问题有回应、对本土实践有借鉴的中国特色管理研究,首先要深入企业实践,洞见兼顾理论价值与现实需求的“真问题”^[1],基于前述复合情境观构筑兼具时空视角的情境敏感性,以形成“新背景-新过程”双维问题筛选机制。

具体来说,要夯实本土管理研究前端的问题发现,其一,有必要基于时空情境敏感性识别研究对象所处的“新背景”。管理学科相较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旨在探索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管理活动本质规律,其理论前提与假设具有更强的“情境依赖性”^[1],而建立情境的时空敏感性,即时更新并充分考量本土情境在相应研究时点下的显著特征,从而在立足“新背景”的基础上提高研究前提与假设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当前,随着我国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以百度、腾讯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企业和以大国重器企业、隐形冠军等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企业均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已然挑战了成熟管理理论中的诸多前提假设。要探索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管理活动本质规律,亟须在拓展或建构理论时避免照搬或沿用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技术劣势等泛化或单一化的情境假设与前提。一方面,可通过纳入时间视角考量既有假设条件在当前时点下的适用性、合理性与时效性^[1],并依托情境演变的谱系化思路,在企业实践与本土情境共演的动态背景下进行独特研究问题的识别与挖掘^[37]。另一方面,也可以纳入空间视角考量不同情境要素组合在国内外、不同行业间、区域间的差异化呈现,借助多重情境组合识别研究对象所处的多元化背景。

其二,亦能够基于时空情境敏感性洞察研究问题所覆盖的“新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既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连续性情境渐变过程,也经历了由信息化、智能化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颠覆性情境剧变场景,从而助推了大量企业通过高端化、数字化或平台化等在世界舞台实现突围领先。要挖掘此类领先实践背后与其他经济体不尽相同的独特管理过程,须基于时空情境敏感性兼顾纵向对比的动态性与横向对比的复杂性,从而为有价值的现象发现和独特研究问题识别提供回溯性思路^[32]。具体来说,纵向对比各个情境要

素呈现出的从无到有、从空白到完善、从缺失到丰富的动态演进历程,不仅能够凸显各类企业对外部情境的响应模式与战略变革速度,也为长期处于新旧情境交替下的企业家悖论思维等动态管理认知研究提供了土壤^[54]。除单一情境要素的纵向演变特征外,多重情境要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化影响与交互作用,也是洞察研究对象发展过程独特性的重要来源。通过横向对比不同场域间的制度演变、城乡间的市场演变与产业间的技术演变等差异化过程,在空间维度下识别多重情境的非同步演进及其交互影响的复杂性,亦将有助于挖掘不同类型、行业或所有制企业变革过程中的多元触发因素或压力源。由此,立足新背景与新过程,形成基于时空情境敏感性的双维问题筛选机制,为挖掘新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式创新管理规律提供独特研究视角支撑。

3.2 平衡情境嵌入与涤除厘清“真贡献”

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一方面可以揭示本土企业独特管理实践的内在规律,回应企业关切并促进本土领先企业实践经验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与应用;另一方面也具备开发原创性、普适性理论的潜力,通过与已有理论迭代对其进行补充、拓展乃至创新,从而推动管理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5,7]。管理学科的实践属性决定无法脱离底层情境要素来探讨表层管理模式与方法等的有效性,要推动本土管理研究实现“本土实践可应用、西方理论可桥接”的双重作用与属性,尚需要兼顾本土情境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嵌入”与“涤除”。

其一,通过深度情境嵌入凸显“现象化”与“构念化”的本土特色。情境作为孕育管理实践的底层因素,可将其作为背景、解释变量、调节变量或情境化新构念等嵌入管理研究。当前本土研究多集中在背景与变量层面,较少到达新构念开发的层次,这也是其难以在西方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留下印记的原因之一^[15]。为提高情境在管理研究中的嵌入深度,一方面研究者需在聚焦管理现象时含摄情境,在采集企业独特经营管理实践过程数据的同时,将与之相关的离散化情境背景囊括其中,加强数据完整性以提升管理实践的现象化水平。另一方面,在借助理论视角将现象构念化的过程中,可引入兼顾动态性与复杂性的复合情境观,将独特本土情境以谱系化或组合化形式深度嵌入本土研究框架中,从而推动探索本土情境对研究问题的直接作用和深层影响^[5]。正如和谐管理、家长式领导、关系等本土化管理思想在提出时,均在动态、复杂的社会关系、儒家文化等中国独特情境中识别出西方理论难以解释的管理现象^[55],并将本土情境与研

究问题的共演过程深度融入研究框架,从而提出广受国际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构念。

其二,通过边界刻画与情境涤除实现“理论化”的整体普适。在本土管理研究后端的理论化与贡献析出过程中,则需要兼顾研究的价值性与普适性,从纷繁复杂的独特本土情境中抽象出研究发现适用的边界条件,以在析出理论贡献时涤除本土情境的独特性与唯一性,拓展研究发现的普适性,从而打造与已有理论体系的对话接口^[56]。比如,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制度刚性不仅体现为国家部委对大国重器创新生态系统提供的丰富政策条件与资源

供给,也促进了核心企业主导下技术集中攻关模式的构建,并形成了制度导向型国内外市场需求。多种情境的复杂交织已然成为我国复杂产品系统创新实践的独特背景,而通过在多重情境交织网络中,将研究发现的适用前提系统地边界化,如制度型市场、政企关系演变^[39]等,则有助于本土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开发实现“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综上,基于复合情境观在本土理论建构的现象化、构念化与理论化等多个环节中的不同嵌入角色,明确了本土管理研究聚焦“真问题”挖掘“真贡献”的具体策略,形成如图4所示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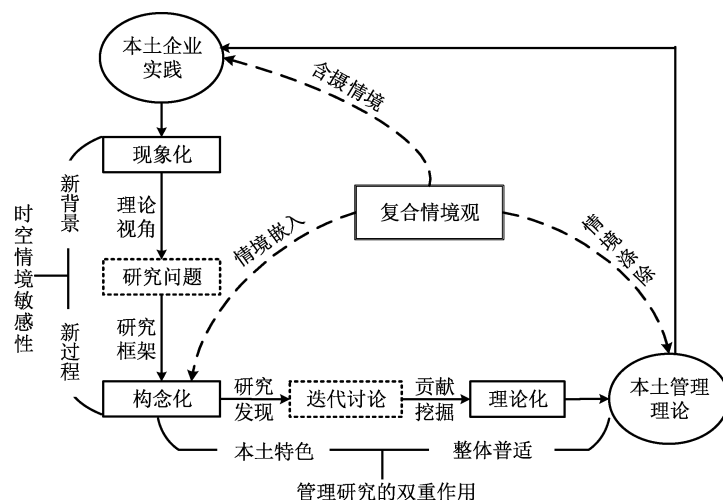


图4 复合情境观下的本土管理理论建构过程

Figure 4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under the composite contextual view

4 结语

中国企业伟大实践的不断涌现,必将成为孕育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最佳土壤。本土情境作为管理实践不可分割的基本载体,也是促进管理理论与企业实践交融共生的底层影响要素。为缓解当前“西方理论难适用、本土理论难开发”的现状,改善当前研究对本土情境的认知泛化、碎片化、静态化等问题,本文在已有情境架构观与要素观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兼顾静态与动态、时间与空间、单一要素与多元组合,形成基于动态性与复杂性双重维度的复合情境观。一方面,以谱系化思路加深了对本土情境要素连续演变的速率、幅度及非对称性等动态性规律的本质理解;另一方面,以组合化认知拓展了对多重情境要素间的叠加、传导与冲突等复杂性特征的识别。进而,研究明确了基于复合情境观的本土理论建构过程与策略,以兼具时空视角的情境敏感性,形成“新背景-新过程”双维问题筛选机制,进而通过平衡本土情境在理论研究不同环节中的“嵌入”与“涤除”,推动本土管理理论研究走向兼顾“本土特色”与“整体普适”的深度情境化阶段。

此外,研究提炼的复合情境观,主要以当前研究广泛关注的制度、市场、技术三个情境要素的动态特征与复杂组合为基点,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阴阳思维、以人为本、合和理念等尚未得到深入探索的社会、文化情境要素,也可能呈现出显著的动态演变与复杂交互特征。因此,复合情境观中呈现的要素多元化与组合多样性,仍有待通过更广泛的实践调研和理论凝练加以丰富延伸。同时,虽然本土管理研究前端的问题提出与后端的贡献迭代,均是彰显中国特色理论研究的重要环节,但对于复合情境观如何全面融入本土管理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其承担的多元角色及嵌入模式也将伴随着本土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而得到进一步拓展。此外,复合情境观虽立足解构中国情境、挖掘中国问题,但其中涵盖的部分情境要素特征或非中国企业所独有,如何进一步识别本土情境的特殊性与研究边界的普适性,以促进本土管理研究的理论对话与贡献识别,仍有待更多本土化研究的深入探索。总体上,立足彰显中国特色的复合情境观仍需未来研究进一步丰富、完善与应用,既离不开本土管理学

者的高度重视,并深入企业实践展开大规模调研,也有待从多维视角下凝练对现实问题和特色理论的敏锐洞见。

参考文献

- [1] 王永贵,汪寿阳,吴照云,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J].管理世界,2021,37(6):1-35.
WANG Y G, WANG S Y, WU Z Y, et al. Fully implementing the Xijiping general secretary'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ork and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nageme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6): 1-35.
- [2] 周泽将,王浩然,修宗峰.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基于 NSFC 管理科学 A 类期刊刊文(2013—2020 年)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1,37(9):57-77.
ZHOU Z J, WANG H R, XIU Z F. Constructing China's characteristic management theory system active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rticles in NSFC management science A journals(2013—2020)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9): 57-77.
- [3] 魏江,杨佳铭,陈光沛.西方遇到东方:中国管理实践的认知偏狭性与反思[J].管理世界,2022,38(11):159-174.
WEI J, YANG J M, CHEN G P. When the west meets the east: The cognitive parochialism and reflec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11): 159-174.
- [4] 张玉利,吴刚.新中国 70 年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历程回顾与展望[J].管理世界,2019,35(11):8-18.
ZHANG Y L, WU G.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cientific cours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70 years of new Chin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11): 8-18.
- [5] TSUI A S. 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6, 2(1): 1-13.
- [6] 苏敬勤,刘畅.中国情境架构及作用机理——基于中国企业战略变革案例的质化研究[J].管理评论,2015,27(10):218-229.
SU J Q, LIU C. Chinese context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A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cas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trategic change [J]. Management Review, 2015, 27(10): 218-229.
- [7] 魏江,刘洋.中国企业的非对称创新战略[J].清华管理评论,2017,10:20-26.
WEI J, LIU Y. The asymmetric innov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J]. Tsinghua Business Review, 2017, 10: 20-26.
- [8] 曾萍,吕迪伟.中国企业成长战略选择:基于三种基础观的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4):51-57.
ZENG P, LYU D W. Growth strategy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basic views [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5, 32(4): 51-57.
- [9] 井润田,程生强,袁丹瑶.本土管理研究何以重要?对质疑观点的回应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8):3-16.
JING R T, CHENG S Q, YUAN D Y. Why is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important? Responses to previous questioning view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20, 42(8): 3-16.
- [10] JIA L D, YOU S Y, DU Y Z.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 three-decade review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2, 8(1): 173-209.
- [11] 吴晓波,余璐,雷李楠.超越追赶:范式转变期的创新战略[J].管理工程学报,2020,34(1):1-8.
WU X B, YU L, LEI L N. Beyond catch-up: Innovation strategy in the period of paradigm shift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20, 34(1): 1-8.
- [12] 蓝海林,张明,宋铁波.“摸着石头过河”:动态与复杂环境下企业战略管理的新诠释[J].管理学报,2019,16(3):317-324.
LAN H L, ZHANG M, SONG T B.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under dynamic and complex environment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3): 317-324.
- [13] 田志龙,杨玲.中国情境与管理创新——“中国管理 50 人”论坛(2019 年春季)会议侧记[J].管理学报,2019,16(8):1127-1132.
TIAN Z L, YANG L. Chinese context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Sidelights on the Chinese management 50 forum April 20, 2019 in Guangzhou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8): 1127-1132.
- [14] 任兵,楚耀.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概念、内涵和路径[J].管理学报,2014,11(3):330-336.
REN B, CHU Y. Chinese management study: Concept, meaning and path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11(3): 330-336.
- [15] 苏敬勤,贾依帛.我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现状、应用前景及情境化深度[J].管理学报,2018,15(6):791-802.
SU J Q, JIA Y B. The research status, application prospects and contextualized depth of case studie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15(6): 791-802.
- [16] 苏敬勤,刘畅.中国企业外部情境架构构建与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38(3):3-18.

- SU J Q, LIU C. External contex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a literature review[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6, 38(3): 3-18.
- [17] 李垣, 田龙伟. 中国情景与中国管理研究: 转型特征与文化认知特征的整合观点[J]. *管理学报*, 2013, 10(2): 168-170, 205.
- LI Y, TIAN L W.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of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from institutional field transition perspective[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10(2): 168-170, 205.
- [18] BENNETT N, LEMOINE G J. What VUCA really means for you[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4, 92(1-2): 27.
- [19] 马忠, 刘宇. 企业多元化经营受政府干预、企业资源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10(1): 116-127, 174.
- MA Z, LIU Y.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orporate resources on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J]. *China Soft Science*, 2010(1): 116-127, 174.
- [20] 王军进, 刘家国, 徐文力. 公平偏好下制造商主导型供应链风险传递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21, 29(10): 96-106.
- WANG J J, LIU J G, XU W L. Research on risk transmission of manufacturer-led supply chain under fairness preference[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1, 29(10): 96-106.
- [21] 李靖华, 林莉, 李倩岚. 制造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 基于资源基础观[J]. *科研管理*, 2019, 40(3): 74-83.
- LI J H, LIN L, LI Q 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serv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19, 40(3): 74-83.
- [22] 严若森, 姜潇. 关于制度环境、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多重关系模型与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 2019, 16(1): 72-84.
- YAN R S, JIANG X. The multiple relationship mode land empirical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D invest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1): 72-84.
- [23] 皮圣雷, 蓝海林. 中国横向整合企业竞争策略组合与组织协调性: 转型期制度情境的调节作用[J]. *管理世界*, 2014(4): 81-89, 106, 187-188.
- PI S L, LAN H L.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horizontal integrating in the enterprise competi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harmoniz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system conditions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4(4): 81-89, 106, 187-188.
- [24] 蓝海林, 宋铁波, 曾萍. 情境理论化: 基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探讨[J]. *管理学报*, 2012, 9(1): 12-16.
- LAN H L, SONG T B, ZENG P. An examination of context theorization based on Chinese corporate strategic management practices[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9(1): 12-16.
- [25] 贺锦江, 王节祥, 蔡宁. 场域转变视角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制度创业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9(12): 2231-2240.
- HE J J, WANG J X, CAI N.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of internet platform enterprises from institutional field transition perspective[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9(12): 2231-2240.
- [26] 刘洋. 中国式的创新追赶与超越[J]. *清华管理评论*, 2017(6): 88-94.
- LIU Y. Chinese style innovation to catch up and surpass[J]. *Tsinghua Business Review*, 2017(6): 88-94.
- [27] 杜义飞, 王建刚, 杨振华. 资源双依赖背景下后发企业技术获取行为: 购买还是模仿? [J]. *管理工程学报*, 2018, 32(4): 9-19.
- DU Y F, WANG J G, YANG Z H. Latecomer's technology acquisition behaviors under the context of resource dual-dependence: Purchase or imitate[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8, 32(4): 9-19.
- [28] 林祥. 何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之“特色”[J]. *科学学研究*, 2015, 133(6): 801-809, 823.
- LIN X.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in China[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5, 133(6): 801-809, 823.
- [29] 俞荣建, 王雅萍, 赵一智, 等. 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 “情境-策略”非对称匹配视角[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4): 580-592.
- YU R J, WANG Y P, ZHAO Y Z, et al. Breakthrough mechanism of “stuck neck” technology: “Situation-strategy” asymmetric matching perspective[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3, 38(4): 580-592.
- [30] 张维迎, 程晓农.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日本经济体制考察[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88(1): 18-27.
- ZHANG W Y, CHENG X N. Government behavior in market economy: A survey of Japanese economic system[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1988(1): 18-27.
- [31] 赵武, 陈琳. 印度包容性创新的经验及启示[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32(9): 1-5.
- ZHAO W, CHEN L.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inclusive innovation in India[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5, 32(9): 1-5.
- [32] 苏敬勤, 高昕. 情境视角下“中国式创新”的进路研究[J]. *管理学报*, 2019, 16(1): 9-16.
- SU J Q, GAO X. Research on the approach of “Chinese-styl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1): 9-16.
- [33] 吕越, 陈帅, 盛斌.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 [J]. *管理世界*, 2018, 34(8): 11-29.
- LYU Y, CHEN S, SHENG B. Embedding in global value

- chains will lead to China manufacturing “low end lock”?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8): 11-29.
- [34] 贾依帛, 苏敬勤, 马欢欢, 等. 全球价值链嵌入下隐形冠军企业知识权力演化机理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2, 25(3): 62-74.
- JIA Y B, SU J Q, MA H H, et 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power of domestic leading suppliers embedd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22, 25(3): 62-74.
- [35] 吴晓波, 张馨月, 沈华杰. 商业模式创新视角下我国半导体产业“突围”之路[J]. *管理世界*, 2021, 37(3): 123-136, 9.
- WU X B, ZHANG X Y, SHEN H J.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erspective on how could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o break out the block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3): 123-136, 9.
- [36] 谭劲松, 宋娟, 陈晓红.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进: “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J]. *管理世界*, 2021, 37(9): 167-191.
- TAN J S, SONG J, CHEN X H.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Architect” transi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strategic behavior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9): 167-191.
- [37] 吴晓波, 付亚男, 吴东, 等. 后发企业如何从追赶到超越? ——基于机会窗口视角的双案例纵向对比分析[J]. *管理世界*, 2019, 35(2): 151-167, 200.
- WU X B, FU Y N, WU D, et al. How do latecomers transform from catch-up to beyond catch-up? A longitudi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ases based on window of opportunity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2): 151-167, 200.
- [38] 袁晓玲, 班斓.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区域差异——基于包含资源、环境的非参数核算框架的经济增长分解[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6(3): 48-59.
- YUAN X L, BAN L. The propulsion,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nonparametric accounting framework decompos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46(3): 48-59.
- [39] 魏江, 赵齐禹, 刘洋. 新型政商关系和企业业绩稳健性: 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 *管理工程学报*, 2021, 35(4): 1-13.
- WEI J, ZHAO Q Y, LIU Y. The new type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21, 35(4): 1-13.
- [40] 戚聿东, 李颖. 新经济与规制改革[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3): 5-23.
- QI Y D, LI Y. New economy and regulatory reform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8(3): 5-23.
- [41] 王雪梅, 雷家骕. “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在汽车行业的实施效果评估[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4): 19-23, 57.
- WANG X M, LEI J S. Evaluation of “exchange market for technology” policy in automobile industry [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08(4): 19-23, 57.
- [42] 李显君, 钟领, 王京伦, 等. 开放式创新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影响——基于我国汽车企业的实证[J]. *科研管理*, 2018, 39(1): 45-52.
- LI X J, ZHONG L, WANG J L, et al. Impact of open innov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auto firms [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18, 39(1): 45-52.
- [43] 韩文海, 苏敬勤. 情境感知与战略逻辑“相位转变”: 新兴场域企业创新选择演化路径[J]. *管理评论*, 2022, 34(5): 202-217.
- HAN W H, SU J Q. Context awareness and phase shift of strategic logic: The evolution path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choice in emerging field [J]. *Management Review*, 2022, 34(5): 202-217.
- [44] 邢小强, 周平录, 张竹, 等. 数字技术、BOP 商业模式创新与包容性市场构建[J]. *管理世界*, 2019, 35(12): 116-136.
- XING X Q, ZHOU P L, ZHANG Z, et al. Digital technology, BOP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 market constructio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12): 116-136.
- [45] 唐红涛, 朱梦琦. 跨境电商平台型企业多维协同式价值创造与商业模式迭代演化路径——基于水羊股份的纵向案例研究[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2, 15(6): 606-619.
- TANG H T, ZHU M Q.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value creation and iterative evolution paths of the business model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based on S' young Group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Case Studies*, 2022, 15(6): 606-619.
- [46] 乐云, 李永奎, 胡毅, 等. “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下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及基本演进规律[J]. *管理世界*, 2019, 35(4): 17-27.
- LE Y, LI Y K, HU Y, et al.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and basic evolution law of major projects in china under the dual role of “Government-Marke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4): 17-27.
- [47] 吕铁, 贺俊. 政府干预何以有效: 对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调查研究[J]. *管理世界*, 2019, 35(9): 152-163, 197.
- LYU T, HE J. Wh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effective: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high speed rail technology catch-up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9): 152-163, 197.

- [48] 贺俊,吕铁,黄阳华,等. 技术赶超的激励结构与能力积累:中国高铁经验及其政策启示[J]. 管理世界, 2018,34(10):191-207.
HE J, LYU T, HUANG Y H, et al.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capacity accumulation for technology catch-up: China's high-speed rail experi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8,34(10):191-207.
- [49] 解学梅,王宏伟.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模式与机制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20,38(5):912-924.
XIE X M, WANG H W. The mode and mechanism of value co-creation of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20,38(5):912-924.
- [50] MA H H, SU J Q, GAO X, et al. How do emerging market suppliers reshape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China[J]. Global Networks-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ffairs. 2022,22(4):766-791.
- [51] 胡峰,裘讯,俞荣建,等. 后发装备制造企业价值链转型升级路径分析——逃离“俘获型”价值链[J]. 科研管理, 2021,42(3):23-34.
HU F, XI X, YU R J,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ath of the value chains of lagg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The “escaping but captured” type of value chain[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21,42(3):23-34.
- [52] 胡大立,殷霄雯,谌飞龙. 战略隔离、能力丧失与代工企业低端锁定[J]. 管理评论, 2021,33(9):249-259.
HU D L, YIN X W, CHEN F L. Strategic isolation, capability loss and low-end lock-in[J]. Management Review, 2021,33(9):249-259.
- [53] 何佳讯,葛佳烨,张凡. 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世界贡献:国际合作、前沿热点与贡献路径——基于世界千种管理学英文期刊论文(2013—2019)的定量分析[J]. 管理世界, 2021,37(9):36-67.
HE J X, GE J Y, ZHANG F. The world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to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frontier hot spots and contribution approach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a thousand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management journals (2013—2019)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37(9):36-67.
- [54] 罗瑾琰,管建世,钟竞,等. 迷雾中的抉择:创新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与路径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34(11):150-167.
LUO J L, GUAN J S, ZHONG J, et al. Choice in the fog: The enterprise in the context of innovation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es and paths of management paradox coping[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8,34(11):150-167.
- [55] 席酉民,熊畅,刘鹏. 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应用述评[J]. 管理世界, 2020,36(2):195-209, 227.
XI Y M, XIONG C, LIU P. Review and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HeXie management theo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0,36(2):195-209, 227.
- [56] 苏敬勤,刘电光. 含摄情境的管理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J]. 管理学报, 2016,13(8):1105-1114.
SU J Q, LIU D G. Whether can management theories containing context be universality?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13(8):1105-1114.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context in the VUCA era

GAO Xin¹, SU Jingqin^{2*}

(1. School of Maritim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062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0624, China)

Abstract: As a discipline, management possesses strong practical attributes that in turn make management theory highly dependent on context. It may involve complex research objects from multiple levels of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ecosystems, as well as the dynamic nature of management laws that vary over time and evolv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hinese contex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within it, and thus acts as underlying influencing factor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management theory and enterprise practice. In the past century, unprecedente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Enterprises operating within China's transition and digital economies have applied innovative Chinese-based practic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nterprises in other economies, and are becoming essential for cultivati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many Chinese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have problems applying advanced Western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their local environmen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studies are based on confirming and expanding Western theory with Chinese data, and few scholars have unearthed new ideas and created new Chinese management laws that are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The issue of applying Western theories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at of developing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ies both point to problems with generalization, fragmentation, and static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inese context.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dynamism and complexity. The findings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between the leading practic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management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tudy's assumptions and methodology, which combines literature analysis,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management context in the VUCA era (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This paper expands the existing structure and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context through a vertical evolution l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a horizontal l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the three core elements commonly contained in Chinese context architecture (institutional, market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ynamic laws of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Chinese contextual elements such as rate, amplitude, and asymm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It also expands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uperposition, conduction, and conflict among multiple contextual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is way,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ntext, such as static and dynamic laws,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context element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this paper not only deepens the rationality and timeliness of the contextual assumptions, but also improves the accuracy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Therefore,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a basic view of a composite context so that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y move towards a deep contextualization stage.

Furthermore, on the basis of presen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discrete and structured to spectral and combinatorial,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the “composite contextual view”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are further explored. First, to examine management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responds to cutting-edge issues and draws on Chinese practice, it was first necessary to conduct a deep investigation into enterprise practice and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real problems that consider both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need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ntextual sensitivity model with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composite contextual view”, to form a two-dimensional, problem-screening mechanism called “new background and new process”. Second, since management theories generally agree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surface management models and method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underlying contextual elem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ual rol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in reflecting Chinese practices and bridging Western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mbedding” and “removal” of Chinese contexts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summar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practices of enterpris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hances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academic discourse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and also provides a strategic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research to the stage of in-depth contextualization, which comprises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iversality.

Key words: Chinese context; Dynamics; Complexity; Composite contextual view; Theory building

Received Date: 2022-12-28

Funded Project: The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1&ZD134)

* Corresponding author